



◎ 徐林祥

像叶圣陶那样当老师

叶圣陶1912年中学毕业，即从事教育工作，先后担任过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教师。1941年，他在《如果我当教师》一文中表达了他从教30年对当教师的思考。时隔70多年后的今天，重读这篇文章，对于我们当好老师，仍然极富指导意义。

一.“养成好习惯”——教育的含义

“养成好习惯”，是叶圣陶在《如果我当教师》中给教育所做的界定。他说：“我想‘教育’这个词儿，往精深的方面说，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，可就粗浅方面说，‘养成好习惯’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。”

叶圣陶指出：养成好习惯，要“从最细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”。他举例说：譬如门窗的开关，我要教他们轻轻的，“砰”的一声固然要不得，足以扰动人家心思的“啞呀”声也不宜发出；直到他们随时随地开关门窗总是轻轻的，才认为一种好习惯养成了。他认为：这样的好习惯，不仅对于某事物本身是好习惯，更可以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。对于开关门窗那样细微的事，尚且不愿意扰动人家的心思，还肯作奸犯科，干那扰动社会安宁的事吗？

叶圣陶还指出：好习惯，“硬是要养成，决不马虎了事”。他举例说：一个词儿，不但使他们知道

怎么念，怎么写，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含义和限度，该怎样使用它才得当。一句句子，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说，怎么讲，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语气和情调，该用在什么场合才合适。一篇故事，不但使他们明白说的什么，更要借此发展他们的意识。一首诗歌，不但使他们明白咏的什么，更要借此培养他们的情绪。他认为：教识字、教读书只是手段，养成他们语言的好习惯，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，才是终极的目的。

二.“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”——课程的目标

叶圣陶在《如果我当教师》中说：“我无论担任哪一门功课，自然要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，如国文科在训练思维，养成语言文字的好习惯；理化科在懂得自然，进而操纵自然之类；同时，我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，那就是‘教育’——造成健全的公民。”

教师要“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”，即认清教师所承担的那门功课的特有目标。以国文科为例。叶圣陶说：“学习国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。”又说：“语言文字的学习，就理解方面说，是得到一种知识；就运用方面说，是养成一种习惯。……这两项的知识和习惯，他种学科是不负授与和训练的责任的，这是国文科的专责。每一

个学习国文的人应该认清楚：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，从而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，就是学习国文的目标。”

同时，教师要“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”，即所有功课承担的“造成健全的公民”这个总的目标。仍以国文科为例。早在上世纪20年代，叶圣陶就提出：“须认定国文是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。”比如：“我们作文，要写出诚实的、自己的话。”1962年，叶圣陶作《语文教学二十韵》有“立诚最为贵”一句。他解释说：“此语自‘修辞立其诚’来，无非‘言之有物’‘言之由衷’之意，而品德修养、实际锻炼亦复包蕴在内。苟德之不修，实之不讲，虽自以为‘有物’，自以为‘由衷’，犹未‘诚’也。”1983年，叶圣陶还专门撰写了一篇《作文与做人》的文章，批评学生作文言行不一的倾向。他说：作文题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要是有一位考生写得头头是道，有理论，有发挥，但是当他离开了考场，挤上了公共汽车，就抢着靠窗坐下，明明有一位白发老太太提着菜筐挤在他膝前，他只当没瞧见，他连给老太太让个座的起码的习惯都没有养成，还有什么资格谈什么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吗？文章最后强调指出：“文当然是要作的，但是要紧的在乎做人。”

三.“课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，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”——教材的功能

叶圣陶写《如果我当教师》正值抗战时期，课本的供给很成问题，往往临到开学买不到一本课本，可是叶圣陶决不说“没有书本，怎么能开学呢”的话。他说：“我相信课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，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。”“课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”，叶圣陶有时也称之为“例子”。在叶圣陶看来，要实现教育的目标，“这些事儿不能凭空着手，都得有所凭借。凭借什么？就是课本或选文。有了课本或选文，然后养成，培植，训练的工作得以着手。”1932年，叶圣陶在《国文科之目的》一文中指出：“课本只是举出些例子，以便指示、说明而已，这里重要在方法。”1942年，他在《略谈国文学》一文中指出：“知识不能凭空得到，习惯不能凭空养成，必须有所凭借。那凭借就是国文教本。”1945年，他在为吕叔湘的《笔记文选读》所作的序中说：“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，从青年现在或将来需要读的同类的书中举出来的例子；其意是说你若如果能够了解语文教本里的这些篇章，也就大概能阅读同类的书，不至于摸不着头脑。所以语文教本不是个终点。从语文教本入手，目的却在阅读种种的书。”1949年，叶圣陶在为《大学国文（现代文之部）》所作的序中说：“国文选本只是个凭借……有了凭借，历练才有着落。”1978年，他在《大力研究语文教学，尽快改进语文教学》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说：“知识是教不尽的，工具拿在手里，必须不断地用心地使用才能练成熟练技能的，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，凭这个例子要使能够举一反三，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。”

课本又“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”。叶圣陶指出：“文字的课本以外还有非文字的课本，非文字的课本罗列在我们的周围，随时可以取来利用，利用得适当时，比较利

用文字的课本更为有效，因为其间省略了一段文字的桥梁。”尤其是公民、社会、自然、劳作课，非文字的课本，简直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叶圣陶关于课本又“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”的思想，是对“课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”的拓展和补充，打通了学校与社会，将课堂延伸至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叶圣陶关于教材功能的论述告诉我们：一方面，教材是教师“教”的“凭借”，学生“学”的“凭借”，因而，教师与学生要创造性地使用教材，而不能成为教材的奴隶，是“用教材教”，而不能局限于“教教材”；另一方面，一切的课外资源都可以拿来当作“例子”，为学生所用，使学生“得法于课内，得益于课外”，举一反三，掌握知识，提高能力，养成习惯。

四.“帮助学生为学”——教学的本质的本质

在《如果我当教师》中，叶圣陶表示不主张将教师的行业叫做“教书”，同样不主张将学生入学校的事情叫做“读书”。他说：“书中积蓄着古人和今人的经验，固然是学生所需要的；但是就学生方面说，重要的在于消化那些经验成为自身的经验，说了‘读书’，便把这个意思抹杀了，好像入学校只须做一些书本上的功夫。因此，说成‘教书’，也便把我当教师的意义抹杀了，好像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并没有什么分别。”在叶圣陶看来，新式教育与旧式教育的一大区别，即在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“只须教学生把书读通，能够去应考、取功名”，而现代教师“却要使学生能做人、能做事，成为健全的公民”。

叶圣陶说：“若有人问我干什么，我的回答将是：‘帮助学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经验，帮助学生为学。’”“帮助学生为学”的思想与“养成好习惯”思想是一致的。对学生来说，是“养成好习惯”；对教师来说，是“帮助学生为学”。这是叶圣陶对教学本质的揭示。这

也就是他在《略读指导举隅》前言中所强调的“各种学科的教学都一样，无非教师帮着学生学习的一串过程”的意思。吕叔湘曾将之解释为：“教学、教学，就是‘教’学生‘学’。”叶圣陶的这一思想，后来更多地表述为“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”。

“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”是教学的最高境界，又是一个重要的教学指导思想，是教学改革的出发点，也是教学改革的归宿。“教”是手段，“不教”是目的。从“教”到“不教”，有一个复杂的、艰苦的过程，这是个启发、引导的过程，也就是教师“帮助学生为学”的过程。通过教师的启发、引导，学生具有自主、独立学习的能力，养成自主、独立学习的习惯，教学由教师帮助学生学逐渐达到学生自主发展的目的。这与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（试行）》：“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，……促进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主动地、富有个性地学习”的精神是完全吻合的。

五.“我要作学生的朋友，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”——师生的关系

1937年，叶圣陶在《给与学生的自由》一文明确指出：“教师和学生，无论如何不应该对立起来。”“教师和学生是朋友。”在《如果我当教师》中，叶圣陶进一步提出“我要作学生的朋友，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”的主张。这是叶圣陶对民主、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的表述。

“我要作学生的朋友，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”，就要爱学生，民主、平等地对待学生。叶圣陶说：“我如果当小学教师，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、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；无论聪明的、愚蠢的、干净的、肮脏的，我都要称他们为‘小朋友’。”他举例说：小朋友顽皮的时候，或是做功课显得很愚笨的时候，我决不举起手来，在他们身体上打一下。打

了一下，那痛的感觉，至多几分钟就消失了；就是打重了，使他们身体上起了红肿，隔一两天也没有痕迹。然而这一下不正是打了他们的身体，同时也打了他们的自尊心；身体上的痛感或红肿，固然不久就会消失，而自尊心所受的损伤，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。“我有什么权利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呢？”

“我要作学生的朋友，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”，还要了解学生，讲究教育的方式方法。叶圣陶说：“凡是在我班上的学生，我至少要知道他们的性情和习惯，同时也要使他们知道我的性情和习惯。”他举例说：“他们如果到我家来，我决不冷然的问：‘你们来做什么？’他们如果有什么疑问，问得深一点的时候，我决不摇头说：‘你们要懂得这个，还早呢’问得浅一点儿的时候，我决不带笑说：‘这还要问吗？我正要考你们呢！’”“这种拒之千里的语言态度，对于不相识的人也不应该有，何况对于最相亲的朋友？”

叶圣陶“我要作学生的朋友，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”的思想与他“以学生为本位”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。早在1919年，叶圣陶发表《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》，就提出“以学生为本位”的主张。他说：“小学作文之教授，当以顺应自然之趋势而适合学生之地位为主旨。”“作文命题及读物选择，须认定作者读者为学生，即以学生为本位也。”1922年，他又在《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》中指出教育的病根之一是教师“不会了解儿童，不以儿童本位一义为教授之出发点”，“学童全居被动地位”。1941年，他在《国文随谈》中更明确提出了学生是“主体”的思想。他说：“国文课是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工作，可是主体究竟是学生。”

叶圣陶“我要作学生的朋友，我要学生作我的朋友”的思想也是与现代教育以学生为主体，实现面向全体、全面发展、主动发展的时代潮流相一致的；与当今新课程改

革中“倡导学生主动参与、乐于探究、勤于动手，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、获取新知识的能力、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”，鼓励学生“自主、合作、探究”式学习的精神完全一致的。

六.“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”——教师的要求

“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”，是叶圣陶对自己的要求。叶圣陶先生于1988年2月16日去世后，顾黄初先生写了《叶老最后留下的》一文以示怀念。文章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他1987年6月在北京参加民进中央代表会议时，亲见叶老慈祥的容貌、亲聆叶老的谆谆教言容祥的动人情景。文中提到叶老最后一次讲话的中心：“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”文章写道：“叶老一生确实是这样做了的，所以才能成为人师的楷模，后学的表率。而他老人家直到垂暮之年仍然铭记着两句话，以此自励，以此勉人，希望大家‘广为宣传这两句话’。这精神是何等的感人，这期望又是何等的恳挚！这就是这位现代文化教育的伟人最后留下的箴言！”

“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”，也是叶圣陶在《如果我当教师》中对教师为人为学的要求。所谓“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”，就教师而言，即如叶圣陶所说：“凡希望学生去实践的，我自己一定实践；凡劝诫学生不要做的，我自己一定不做。”他举例说：我希望学生整洁、勤快，我一定把自己的仪容、服装、办事处、寝室弄得十分整洁，我处理各种公事私事一定做得十分勤快；我希望学生出言必信、待人以诚，我每说一句话，一定算一句话，我对学生和同事，一定掏诚相示，毫不掩饰……他说：“必须‘有诸己’‘无诸己’，表示出愿望来，吐露出话语来，才有真气，才有力量，人家也易于受感动。如果不能‘有诸己’‘无诸己’，表示

和吐露的时候，自己先就赧赧然了，哪里有什么真气？哪里还有力量？人家看穿了你的矛盾，至多报答你一个会心的微笑罢了，哪里会受你的感动？”

叶圣陶的《如果我当教师》写于70年前，为什么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极富指导意义？我想，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：一是吸收了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。比如“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”，出自《礼记·大学》；“修辞立其诚”，出自《周易·乾·文言》。二是借鉴了国外先进教育理念。比如：“以学生为本位”“以儿童本位一义为教授之出发点”的思想，就受到杜威“儿童中心”思想的影响。三是融入了自身教学经验与反思。比如：他对“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”数十年如一日的思考。四是掌握了辩证思维的方法。比如，说“课本是一种工具或凭借，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凭借”；再如，既要“认清那门功课的目标”，又要“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”。正因此，使得叶圣陶能够超出常人，透过种种现象，揭示教育的本质和规律。1980年，吕叔湘先生在为《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》一书所写的“序”中说：“按说这本集子里边的文章大部分是解放以前写的，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过时呢？这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新问题，骨子里还是老问题，所以这些文章绝大部分仍然富有现实意义。”笔者以为，吕叔湘这里说的“老问题”，就是关系到教育本质和规律的问题。正因为叶圣陶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和规律，他的教育思想才能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经典，才能成为常读常新的智慧的源泉。

本文凡引叶圣陶语未注明出处者，均引自叶圣陶《如果我当教师》，见《叶圣陶集》第11卷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93-105页。

徐林祥，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责任编辑：晓 苏